

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李培, 邓慧慧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本文描述了1990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在人口迁移的活跃程度和空间分布的新特征。通过建立计量模型, 对1990年和2000年影响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的综合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结论显示: 人均GDP差距已经成为影响人口迁移的首要因素, 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力在逐渐上升。针对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影响, 本文对京津冀地区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京津冀; 人口迁移; 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7)06-0059-05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Migr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LI Pei, DENG Hui-hu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872)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esp. spatial patterns of it and the features of population dynamic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since 1990s. An econometric model has been employed for further analysis of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igration in 1990 and those influencing the migration in 2000.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parity of per capita GDP has dominantly influenced the migration. Meanwhile, market and the upgraded industrial structure begin to show their muscles. Finally, some countermeasures have also bee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Migration; Urbanization

人口迁移本质上是迁移人口对空间差异性的反应, 这种差异性的形成可能是来自于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作为我国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 京津冀自古以来就是人口迁移活跃区。然而, 对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问题的相关研究却略显不足。马小红和李欧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分别对北京市和天津市人口迁移进行了人口结构、区域分布、从业性质、行业分布特征等方面的综合分析, 探讨了两地未来人口迁入的流向和空间分布^[1-2]。王桂新等对比考察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人口省际迁移的特征, 分析了人口迁移与三大都市圈经济增长极化的作用关系^[3]。整体而言, 当前对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的研究多数以描述性分析为主, 没有构建一个严格规范的分析框架。同时, 研究也主要是以单个城市或某一年的分

收稿日期: 2007-03-26

作者简介: 李培(1980-), 男, 山东淄博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问题。

析为主，缺乏对历史数据的对比性分析。在推进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进程中，深入研究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对探寻解决人口迁移带来的种种影响和问题，协调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深远意义。

一、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的特征描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也表现出一些新特征。从省际人口迁移来看，1990年以来北京市人口净迁移率明显呈上升趋势，且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北京市外来人口来源地相对集中，且主要来自于城市化水平在20%~30%之间和人均GDP水平不足1000美元的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对于这些地区的劳动力而言，北京的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河北省2003年的净迁移率仅为0.89‰，2004年更降为-0.04‰，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属倒数之列。天津作为身居华北的直辖市，2001年的净迁移率竟降为-0.94‰，2001年以后呈大幅波动状态。从各省市内部来看，北京市县域主要为人口迁入区，1997年北京市外来人口在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的分布比例为16:63:21，而2000年该组数据变为13:62:25，可见，外来人口居住地有向远郊地区转移的趋势。天津市人口迁移的特点是：县域主要为人口净迁出区，市辖区主要为人口净迁入区，但市辖区人口迁移的活跃程度要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年天津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居住在天津市中心城区的外来人口比例最高，其次依次是远郊区、近郊区和郊区。其中在中心城区生活的外来人口比例为54.36%，显著高于同期北京市在中心城区生活的外来人口13.18%的比例。此外，天津外来人口在郊区生活的比例为7.87%，明显低于北京市的24.77%。由此可见，天津市外来流动人口居住区的“圈层结构”明显——由中心城区向外集中度逐渐降低，河北省市、县人口迁移的活跃程度表现出与北京、天津相反的特征，即市辖区是人口迁移的活跃区，活跃程度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县域人口迁移的活跃程度较低，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二、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的经济计量分析

(一) 变量和数据说明

我们以各省之间迁移人口作为因变量，以工业产值中非国有企业产值比作为市场化水平(Market)的代理变量，将各地公路网密度作为衡量地区基础设施水平(Infra)的代理变量，用非农业占GDP比重表示地区产业结构(Ind)，用各省会城市间铁路距离表示人口省际迁移距离(Dis)，并加入地区人均GDP差距(GGDP)、前期移民(M₋₁)和新增就业岗位(Njob)等控制变量。以上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各省市人口普查资料。

(二) 计量结果分析

从表1的回归结果中不难发现不同时期影响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的因素变化明显。具体而言，1990年人口迁移的回归方程显示前期移民、迁移距离和新增就业岗位依次是影响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的前三大因素，而2000年的人口迁移方程显示前三大因素已变为人均GDP差距、前期移民和新增就业岗位。

1. 经济水平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明显提高

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比较活跃的地区主要为经济水平发展较快的区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较为明显的“圈层式”分布特征。从内圈层来看，1984年以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等产业区的出现已经成为核心城市辐射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吸引外来人口迁入的“磁石”。从外圈层来看，京津冀地区经济比较活跃的边界区域主要包括以毗邻北京和天津的高碑店、涿州、霸州等“核心城市型边界区域”和地处京津走廊内部及其外部区域的廊坊市、保定东部地区、唐山西南部地区等“核心地域型边界区域”两大类。这些区域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吸引了国内外大量资金投入，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明显，基础设施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逐步成为人口迁入的主要目标区域。此外，秦皇岛、天津大港、黄骅港、京唐港和曹妃甸等港口城市的

发展客观上扮演着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枢纽和港口的角色。随着“港口开发区—新城—主城区”的多核结构发展模式逐步形成，这些区域将会成为未来京津冀主要的人口迁入区。

表 1 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影响因素

解释变量	1990年人口迁移方程	2000年人口迁移方程
人均GDP差距 (GGDP)	0.045 (0.067)	0.214* (0.073)
产业结构 (Ind)	0.106 (0.078)	0.170* (0.084)
新增工作岗位 (Njob)	0.168* (0.082)	0.190* (0.076)
市场化水平 (Market)	0.155 (0.098)	0.099*** (0.109)
迁移距离 (Dis)	- 0.239* (0.090)	- 0.120 (0.101)
基础设施 (Infra)	- 0.099* (0.081)	- 0.057 (0.073)
前一年移民 (M ₋₁)	0.339* (0.070)	0.198* (0.073)
LM 检验 P 值	0.432	0.135
White 检验 P 值	0.142	0.637
调整 R ²	0.567	0.676
F 检验 P 值	0.000	0.000
观测值	162	174

注：①为了便于比较各个变量的影响力度，我们采用标准化的回归方程。

②*、**、*** 分别表示通过 1%、5%、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标准差。

2. 产业结构变迁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

从回归方程的结果来看，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人口迁移的作用表现明显。1985~1990年京津冀地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弹性分别为 0.12、0.18 和 0.09，表明第二产业对劳动力就业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1995~2000年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弹性上升到 0.16，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增长弹性分别下降为 -0.1 和 -0.07。在整个京津冀地区吸纳社会劳动力能力普遍弱化的大背景下，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就业的能力越发凸显，就业弹性系数相当于 GDP 就业弹性系数的 9.64 倍，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北京市人口迁移主要为省外迁移，迁入人口主要从事商业和服务业；天津市和河北省人口迁移主要为省内迁移，迁移人口主要从事与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相关的职业，比例分别为 30.4% 和 26.6%，这些岗位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较轻。根据 2000 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 0.95% 抽样原始数据，按户籍人口计算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 15.43%、12.69%、10.51%，而按常住人口口径计算的相关比例分别为 13.38%、12%、10.59%，由此可见，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对区域人口老龄化趋势具有缓解作用。

3. 人口迁移对新增就业岗位表现敏感

受体制的制约，农村迁移人口进城后主要在非正规部门从事着一些城市居民所不愿从事的工作。也正是由于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受到政府保护，使得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柔性更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失业问题。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之所以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主要是由于他们预期到能够从得到的城市正规部门工作机会中获得补偿，因此他们对城市内部新增就业岗位表现得十分敏感。

4. 市场化水平对人口迁移的影响逐渐显著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在户口、粮食供应、就业安排、福利保障等方面严格区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实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并通过城乡“剪刀差”来保证国家加速工业化需要的原始积累。但时至今日，国家在根本制度上，仍没有改变就业、户籍、社会保障等城乡不平等政策，给人口迁移带来很大障碍。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推进以及地区收入差距的显性化，决定人口迁移的因素已经逐步转变为迁移主体对迁移收益和风险的对比。通过对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的偏好指数计算可以发现，1985~1990年北京、天津、河北的迁移人口迁入的偏好指数分别为647、285、88，1990~1995年相应数值分别为681、270、87，1995~2000年相应数值分别为532、219、41，这一变化恰恰与不同地区市场化的进度相符。

5. 迁移距离对人口迁移的影响逐渐减弱

从回归方程的结果来看，迁移距离与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呈负相关。从迁入人口来源地和迁出目的地来看（表2），每个省、市均存在几个相对稳定的、集中的和距离相隔较近的迁入人口来源地和迁出目的地，这反映出“邻近优先”的迁移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交通一体化逐步成为京津冀区域整合的“先锋”，如京津冀城际快速交通的规划建设、河北省“五纵六横七条线”高速公路网的建设等均降低了人口迁移的交通成本，增加了他们对迁入地区净收益的主观预期。

表2 中国省际人口迁入和迁出前三个主要来源地的比重

%

地区	第一来源地		第二来源地		第三来源地		合计	第一目的地		第二目的地		第三目的地		合计
	省名	比重	省名	比重	省名	比重		省名	比重	省名	比重	省名	比重	
北京 ^a	河北	29.0	四川	5.9	山东	5.7	40.6	河北	20.9	江苏	8.8	湖南	7.4	37.1
北京 ^b	河北	14.3	山西	7.7	辽宁	7.3	29.3	河北	13.9	广东	8.1	山东	7.8	29.8
北京 ^c	河北	27.4	河南	13.7	安徽	7.9	49.0	河北	34.9	安徽	21.3	广东	8.7	64.9
北京 ^d	河北	20.1	河南	12.5	安徽	8.1	40.7	河北	14.9	江苏	10.1	广东	7.8	32.8
北京 ^e	河北	19.5	河南	16.0	安徽	7.9	43.4							
天津 ^a	河北	35.4	甘肃	9.4	宁夏	7.8	52.6	河北	37.6	北京	27.5	江苏	10.1	75.2
天津 ^b	河北	25.8	北京	9.3	山西	9.2	44.2	河北	28.1	北京	22.5	山东	7.2	57.8
天津 ^c	河北	38.4	山东	15.0	河南	7.2	60.6	河北	30.0	北京	27.7	江西	7.2	64.8
天津 ^d	河北	22.2	山东	15.3	河南	7.9	45.4	河北	22.8	北京	20.0	山东	6.0	50.3
天津 ^f	河北	22.9	山东	19.8	黑龙江	11.6	54.3							
河北 ^a	湖南	31.1	山西	9.9	内蒙古	6.4	47.5	北京	12.2	天津	16.8	山西	12.2	62.7
河北 ^b	山西	13.5	黑龙江	12.9	北京	12.5	38.9	北京	19.6	天津	14.1	河南	11.8	45.4
河北 ^c	黑龙江	16.1	浙江	10.3	四川	9.4	35.7	北京	41.2	内蒙古	18.5	山西	7.2	66.9
河北 ^d	黑龙江	13.4	河南	10.0	内蒙古	8.0	31.4	北京	41.6	天津	12.5	内蒙古	5.6	59.7

注：① a、b、c、d分别表示1987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99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② e、f数据分别来自2003年北京市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资料和天津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

6. 前期移民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始终明显

人口迁移本身反映的是一种利益的摩擦和冲突，迁移的收益越大也往往意味着迁移的机会成本越高。迁移现象一方面平滑了迁移主体对进城工作、生活的不稳定预期，另一方面，中国结构中所表现出的“差序格局”，也使得“城内关系”的亲疏成为决定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蔡研究发现，75.8%的省内迁移者，82.4%的跨省迁移者的就业信息是通过住在城里或在城里找到工

作的亲戚、老乡、朋友获得的。因此，人口迁移的流向通常会受到距离所反映出的社会网络强弱的限制，表现出分阶段迁移的特征。迁移人口往往不是以分散的方式生存于城市的不同角落，而是集中在一起，形成了地理边界明确的“准社区”。人们在这些区域中不但进行着一般的生活和感情上的沟通，同时也进行着生产经营上的密切协作和分工，并建立了相当广泛而层次不同的社会联系，北京市的“浙江村”、“新疆村”、“温州村”等就是这种迁移模式的典型。

7. 基础设施水平对人口迁移的作用减弱

回归方程的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水平与人口迁移数量呈负相关。京津冀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不断吸引着大量人口涌入，然而，总体上看外来人口居住的“生态”并不理想，且主要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居住地的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外来人口居住地主要零星点布在整个现代化大城市的一些“角落”。这些城市“角落”基本上是市区尚待改造的“城中村”或郊区临时搭建的危筒、违章的“棚户区”。这种“城中有村，村中有城；城外现代化，村内脏乱差”的居住环境，显然与我们城市化追求的城市环境格格不入。第二，居住形式多种多样，但主要以“租赁房屋”和寄住“宿舍、工棚”为主，居住条件较差。以北京和天津为例，2003年北京市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资料显示，51.3%的外来人口住所形式为租住房屋，20.6%的外来人口住所形式为单位宿舍；同期，天津市公安局六处公布的资料显示，43.1%的外来人口住所形式为租住房屋或居住在工地现场。由此看来，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是为了通过付出辛勤的劳动获得更高的报酬以及享受城市生活，然而现实中他们却不得不在城市体制薄弱的边缘营造“都市里的村落生活”，并没有完全享受城市化的成果。

三、结语

本文试图在对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现状描述的基础上，通过计量分析阐释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构建规范的分析框架。结合本文对迁移动因的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从迁移原因的构成来看，日益明显的区域经济差异成为影响京津冀地区人口迁入的主要因素，证明了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动机是人口迁移的一般规律；同时，迁移人口的职业构成特征由第二产业为主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也符合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随经济发展而凸显的规律。因此，应把人口迁移政策与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起来，在移民结构上尽可能从体力型为主过渡到智力型或科技型移民为主，着眼于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为智力或科技型移民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2. 迁移距离对人口迁移的影响逐渐减弱，前期移民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始终明显，说明近年来京津冀人口迁入过程中的“盲流”现象逐渐减少，但传统的社会网络联系与规范的劳动力市场相比对迁入人口仍有较大影响。这说明政府应该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为劳动力寻找工作提供更充分的信息和更方便的服务，同时满足各地区经济发展对不同层次劳动力的需要。

3.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京津冀今后应进一步改革城镇户籍管理制度，调整大中城市户口迁移政策，保障公民正常迁移和择业权力，促进人口在城乡、区域间合理流动和分布，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同时还要考虑到，京津冀作为典型的缺水地区，水资源对工业、农业、经济发展和人口容量都有很大限制，今后人口迁移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对人口迁移规模加以合理限制，对人口迁移给地区发展条件、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所带来的变化要作更为详细的论证。

参考文献：

- [1] 马小红. 新城市规划下的北京市迁移流动人口[J]. 中国人口科学, 2005, (S1): 16-21.
- [2] 李鸥. 天津市人口迁移情况的研究与思考[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03, (3): 77-80.
- [3] 王桂新, 毛新雅, 张伊娜. 中国东部地区三大都市圈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极化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5): 1-9.

[责任编辑 崔凤垣]